

大国经济论

李 由 著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 北京 ·

导 言

中国是一个经济和政治大国，国家规模是约束经济发展和政府管理的一个重要因素，大国的经济发展和政府管理由此具有许多不同于中小国家的特征，但现代经济学对之几乎是置之不理，不求甚解。本书的研究目的在于考察和揭示国家规模约束下的经济发展和政府管理的特征方式，为中国的经济发展和政府管理体制改革提供理论和方法上的参考。

一

对许多事物，人们耳濡目染，但并不了解其真实底蕴；对许多事物，人们似乎了解，但往往知其一而不知其二，甚至知道得似是而非。在经济学的发展历史中，可以找出许多例证。分工和交易是亚当·斯密在《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中首先论述的问题，现代经济学的历史应该从对分工和交易的分析开始。然而，经济学对分工问题至今尚未作出应有的分析；对交易问题的理论分析也是在J·康芒斯、R·H·科斯那里才真正开始。在某种意义上说，国家规模约束下的经济发展和政府管理的具体型式也是现代经济学没有充分重视的范畴，虽然早在威廉·配第的《政治算术》、亚当·斯密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关于法律、警察、岁入及军备的演讲》中已经十分重视这一问题。政治学、历史学、管理学等学科虽然研究了国家规模和政府管理问

题，但那毕竟不能代替经济学的严格规范分析。

经济学对国家规模约束下的经济发展和政府管理的漠视可以从政府问题的研究上明显看出，政治制度和政府管理对经济发展的巨大影响与现代经济学对政府的熟视无睹和无能为力形成了强烈的反差。如果把经济自由理解为企业可以自主决定其生产、销售和收入分配，居民可以自主决定其购买和消费活动，也就是说在资源的占有、配置和使用方面，居民和企业享有最广泛的选择自由，并且对自己的选择负有责任；把政府管理或政府干预理解为政府为控制企业的生产、销售和价格，以及居民的购买和消费而采取的各种活动，那么可以说，对经济自由和政府管理这二者的孰优孰劣、孰主孰辅，一直是学术界悬而未决的理论问题。

从经济思想史上看，弗朗索瓦·魁奈、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等人主张自由放任、完全竞争的经济自由，让·沙尔·列奥尔·西斯蒙第、比埃尔·约瑟夫·普鲁东等人则呼吁政府对经济活动进行干预，弗里德里希·李斯特更是明确反对古典学派的自由贸易政策，主张关税保护。空想社会主义者和科学社会主义者都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矛盾，尽管前者希望通过和平道

如今，经济自由一般指市场机制中的交易和竞争自由，市场成为资源配置的基础性方式；政府管理、政府干预、政府管制、政府调控等概念的内涵大致相同，即政府对生产、销售、价格、以至消费的管理控制活动。中国经济学界又广泛用宏观调控表示政府管理，尽管政府管理的对象不仅包括宏观经济总量，而且包括微观经济主体。这样，经济自由与政府管理的相互关系可以简单地理解为市场与政府的相互关系。企业一般理解为市场的主体，但国有企业具有政府管理的某些性质，国有企业是政府职能的特殊延伸形式。本书主要使用政府管理一词表示政府对企业、市场的管理调控活动，有时也使用政府干预、政府调控等概念。此外，本书中的国家是指包括政府、居民、领土、主权等内涵的概念，而不是中国学术界经常等同于政府的狭义概念；本书中的政府是指包括立法、行政、司法等政府机构的广义政府概念，而不是中国经常等同于行政机构的狭义政府。另外，中国由于长期实行党政合一的政治体制，中国共产党是领导政府管理和社会经济发展的核心力量，党的政策就是政府的政策，因此本书中的中国政府是指以中国共产党为核心力量的政府。

路来改造资本主义，后者坚持用革命手段来推翻资本主义，但他们都主张建立社会主义新制度，而传统的社会主义经济正是政府计划主导的经济。从边际革命到马歇尔体系，其基本观点依然是传统的经济自由主义。阿弗里德·马歇尔之后，瑞典学派、米恰尔·卡莱斯基、梅纳德·凯恩斯又重新打出政府干预的大旗。凯恩斯主义直到近半个世纪之后，才受到新货币主义、理性预期学派的全面冲击。在凯恩斯主义和各种新自由主义鏖战正酣、胜负难分之际，所谓的新制度经济学、新凯恩斯经济学从混战中脱颖而出，成为当代林林总总的经济学流派中影响甚大而又强调政府管理的新军。经济理论和经济主张之光折射到政府经济政策上，就表现为政府时而倾向经济自由，时而倾向干预调节，政策在自由和管理之间不断摇摆。

综观经济思想和经济政策的演变过程，几乎所有的经济学家和政治家都承认政府管理经济的必要性。亚当·斯密坚信最好的政策就是自由放任，但他的体系里保存了充当“守夜人”的政府，政府至少要在国防、保障私人产权和公共设施上承担职能。理性预期模型试图证明旨在降低失业率的总需求管理将永远是无效的，但现实中的芸芸众生并不像天才的经济计量学家那样对未来作出准确无误的预测。实际上，崇奉自由竞争的欧美诸国正是依靠强大完备的法律制度才保障了市场经济的持续运行，政府财政支出在国民收入中的份额也不断扩大，而没有哪一届政府真实行无为无不为的自由经济政策。自20世纪30年代全球性的经济

凯恩斯主义虽然在20世纪70年代没有有效解释滞胀问题而备受诘难，货币主义、理性预期学派在80年代甚嚣尘上，但凯恩斯主义的许多政策主张并没有从政府管理内容中消失。现代西方国家的政府经济政策是一种兼有凯恩斯主义、货币主义等多种理论色彩的混合体，正如西方经济体制被萨缪尔森称为混合经济，西方经济政策也可以称为混合政策。对策论等数学方法在当代经济学界的广泛使用，也正是为了有效解释企业、居民、政府等经济主体之间的相互对策行为。

大危机之后，各国政府或者加强了对经济的管理控制，或者实行了社会主义制度。对于政府、市场、企业之间的经济关系，以及政府的性质、运行和功能，人们可以有大相径庭的定义和理解，但政府已不再是超然于经济活动之外的因素，而是全面影响经济活动的内生变量。

尽管政府在现代经济体系中承担着不可或缺、日益重要的职责，传统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更把政府的作用发挥到极端，然而现代经济学，以及管理学、政治学、历史学等学科并没有真正明了政府角色的内在机能和行为特征，神秘而善变的政府时而成为经济稳定有效运行的保护人，时而成为经济混乱低效的肇事者。马克思主义通过论证资本主义经济矛盾的不可调和和经济危机的周期爆发，宣判了资本主义的死刑。西方经济学在最终承认市场失灵的基础上，也开出了改良资本主义的药方。不过，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种种缺陷和失灵，只是政府管理经济的充分性条件，因为政府并不是市场的唯一替代者，而不是政府管理经济的必要性条件。即使政府是市场的唯一替代者，经济理论仍需说明清楚：政府应该在哪些领域、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对市场进行替代，政府替代市场的成本和收益如何。而在这些方面，现代经济学或语焉不详，或力有不逮，政府很难得到经济学家明晰的理论指导，更不用奢望经济学家提出具体可行的政策建议。

中国从过去到现在一直是一个政府管理对经济发展影响巨大的国家，中国经济是一种政府主导型的经济。新中国成立以来特

政府当然是市场的一个重要的、有时是主要的替代者，而道德、意识形态、行业协会等也是调节经济活动的重要因素，从市场失灵并不能必然得到政府干预的结论，何况政府也有失灵效应。见：

[美]C. 查尔斯·市场或政府——权衡两种不完善的选择·兰德公司的一项研究·
谢旭译·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1994

[美]J. E. 斯蒂格利茨等·政府为什么干预经济·郑秉文等译·北京：中国物资出版社，1998

别是自1978年以来，中国几次在政府管理体制上进行调整和改革。然而，经济条块分割、政府职能混乱、管理方式不当等体制顽症积重未愈，1993年的“三定”改革和1994年的分税制依然没有从根本上改善政府管理方式，1997年党的十五大再次把健全宏观调控体系、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作为今后的发展目标，并在1998年推出了政府行政机构改革方案。在今后相当长的时间，政府与政治体制、国有经济、工业化将是中国面临的三大发展难题。只有妥善解决了这些内部问题，中国才能真正以大国身份活动并竞争于当代世界。

二

通过理论与实践上的比较和分析，发现国家规模约束下的经济发展和政府管理的一般型式，提出大国政府在经济发展和管理方式上的调控原则、方法、途径、内容和目标，将是试图达到的研究目的。

有多种因素决定或制约着中国的经济发展和政府管理方式：国家规模、技术变革、所有制性质和结构、市场化程度和市场缺陷、经济开放、意识形态和文化传统，等等。更具体地说，第一，中国是一个人口众多、国土辽阔、经济总量巨大的国家，国家规模对经济发展和政府管理显然具有一定的影响，大中小各级的经济发展和政府管理显然具有不同的型式。第二，中国是发展中的国家，虽然工业体系初步建立，但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进程相对滞后，已经实现的经济主要局限于城市及城市周围区域。随着产业结构的转换和对外开放的扩大，落后地区渴望经济迅速发展，发达地区也面临着经济高级化问题。失业、通货膨胀、人口增长过快、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社会保障、地区差距、自然环境资源保护等都是工业化进程中亟待解决的重大问题。第三，中

国是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制度无论怎样定义，公有制经济必须占主要份额，按劳分配必须成为收入分配的基本原则，政府必须采取必要的政策手段，有效调控生产、交易和收入分配活动，以最终实现共同富裕。因此，公有制特别是国有制以及公有制与非公有制的力量对比，将是制约政府管理方式的重要因素。第四，中国是经济体制转型中的国家，市场将成为配置使用资源的基础性方式。市场的发育程度，市场的覆盖范围，市场的缺损失灵程度等直接制约着政府的管理强度和管理广度。第五，经济政治开放程度对政府管理方式的影响也是不言而喻的。第六，意识形态和文化传统。意识形态特别是执政党的指导理论对中国经济发展和政府管理方式的影响力是非常巨大的。1978年真理标准的讨论和对“两个凡是”的批判，1992年邓小平的南方讲话，既是思想解放的活动，又是改革开放的宣言。今后，中国如果能够坚定不移地一切以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这“三个有利于”为根本判断标准，那么就能不断开拓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新局面，政府管理效率就能不断提高。在文化上，中国既有宝贵的传统，又有顽固的糟粕，重人伦而轻法制，重私利而轻公益，重惯例而轻创新、重群体而轻个体等文化传统亟待克服和更新。

由此，人们就可以从不同角度，各有侧重地分析经济发展和政府管理的可能型式。不过，中国学术界过去主要是从经济增长、所有制结构、市场失灵、开放经济、意识形态角度对中国的经济发展和政府管理问题进行了大量研究，很少注意国家规模与经济发展和政府管理之间的相互关系。陈岱孙教授大概是第一个对国

家规模与政府管理之间关系进行研究的现代经济学家。近几年，也有一些人从国家规模、一般均衡等意义上对经济发展和政府管理方式作了某些分析，如关于国际经济大循环、中央与地方之间关系的分析。然而，从总体上看，传统的计划经济理论，以及改革实践中提炼出来的经验型中国经济理论，对经济发展和政府管理方式及其变迁的探讨都有待深入和拓宽。对政府管理问题的分析特别是量化分析，也一直不是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研究内容。T. 凡勃伦、J. 康芒斯等人的早期制度经济学，J. K. 加尔布雷斯的后制度经济学，甚至发展经济学都没有很好地纳入西方经济学的主流进程。当然，这种对经济发展和政府制度的漠视状况近来有所改变，以交易费用、产权、公共选择、对策论等为分析工具的新制度经济学，自80年代以来影响日益扩大。不过，目前人们尚不能得心应手地将西方经济学的这些分析方法用于中国政府管理问题的研究，已有的研究成果多停留在现象的描述和政策的解释上。实践的需要和理论的薄弱都要求加强深化对经济发展和政

陈岱孙在他的博士论文《麻萨诸塞州地方政府开支与人口密度的关系（1926）》中讨论了人口总量和人口密度与教育、公路、经常性等公共支出之间的关系、见：

陈岱孙．陈岱孙文集（上），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
目前已经完成的研究成果有：

关山等．块块经济学．北京：海洋出版社，1990

王绍光，胡鞍钢．中国国家能力报告．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3

魏礼群等．市场经济中的中央与地方经济关系．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1994

陈宪．市场经济中的政府行为．上海：立信会计出版社，1995

杨再平．中国经济运行中的政府行为分析．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5

宋光华等．政府经济职能和体制改革．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5

毛寿龙．中国政府功能的经济分析．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6

辛向阳．大国诸侯．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1996

此外，近期一些出版物虽然在名称上冠以“大国”，但这些论著或者主要是对若干个大国的事实比较，或者主要是对经济现象的描述，还不能称为规范严肃的经济学分析。如：

程极明．大国经济发展比较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

程超泽．世纪之争．中国．一个经济大国的崛起．北京：新华出版社，1998

府问题的研究工作。

全面、系统、深入、准确地分析政府管理问题是一项十分浩大的基础研究工作，绝非少数人短时间内所能完成。其实，只要能从某一角度，对特定国家或少数国家的经济发展和政府管理方式的某一方面或环节进行严肃有效的分析，就已经是极有价值的研究工作了。事实上，古典经济学以及马克思、恩格斯等人的经济理论之所以称为政治经济学，就是因为他们既研究具体历史时期具体国家的经济发展问题，又研究政府、政治法律制度以及社会文化与经济发展的相互关系，这种传统在新古典经济学时期中断了，只是到20世纪下半叶才有所恢复。先是一批关注经济发展问题的经济学家拾起了古典经济学派的研究传统，后是一批受新古典经济学熏陶的经济学家也燃起了对经济发展、政府、制度等问题的研究热情。西蒙·库兹涅茨在研究现代经济增长时就发现，经济增长源于科技进步、社会经济政治制度创新、新世界观等多方面因素。他把经济学的研究对象规定为巨大的人类社会集团的国家：国家是一个主体实体；政府能够作出众多、长期的决策；政府决策创造了经济增长的条件，影响了经济增长过程。

研究具体的或典型的国家中经济发展和政府已经是一项内容庞杂的选题，必须选择特定的研究角度和方法。其中，根据国家的整体特征而对国家进行分类，进而分别研究不同类型国家的政府，诚不失为一种可行的研究思路。实际上，人们已经对国家进行了多种多样的分类工作，其中代表性的分类有：根据经济发展水平和结构特点，把国家分为工业化、劳动剩余、初级产品出口

库兹涅茨在五年后出版的《各国的经济增长》中对国家规模与外贸、经济规模、国内生产总值等因素之间的相互关系进行了创造性的分析。见：
[美]西蒙·库兹涅茨．现代经济增长．戴睿等译．北京：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
1989.13～14

Kuznets, S., Modern Economic Growth.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66

等国家类型；根据国家和政府的发展战略，把国家分类为进口替代、出口导向、封闭发展等国家类型；根据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性质，把国家分为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封建主义等国家类型；根据收入水平和国家综合实力状况，把国家分为穷国和富国、大国和小国、强国和弱国等国家类型。霍利斯·钱纳里等人根据人口、收入水平、出口等因素，对国家进行了二分化分类：先是根据人口总量N，把国家分为大国和小国；随后根据实际出口水平E与根据该国的人口和收入水平得出的预测值E之间的比率，提出了贸易趋向指数TO：

$$TO = (E_p - E_m) / E - (E'_p - E'_m) / E_p = T - T'$$

按照贸易趋向指数TO的高、正常、负值，把大国小国又具体分为初级产品出口导向、正常、工业制成品出口导向等类型。

不难发现，无论是宏观层次上的国家经济、国际经济，中观层次上的区域经济、行业经济，还是微观层次上的企业经济和个人经济，往往在人口或人力、国土或自然资源、收入水平等经济因素上呈现出总量、范围、层次、力量等规模或量的特征，如经济的企业规模、行业规模、国家规模、市场规模、生产规模、资源规模、生产要素规模。而经济达到一定的总量、范围、层次、力量等规模或量时，往往可能发生分工和专业化、交易或管制、竞争或合作、规模经济、范围经济、聚集经济等经济活动的方式和制度上的质变，不同规模的经济可能分形出不同的经济效应、经济结构、经济形式、经济制度和经济变迁路径；或者如哲学家所说的，事物的量有总量、范围、结构等方面上的规模差异，量变

[美] 霍利斯·钱纳里等，发展的型式，李新华等译，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88

钱纳里等人对国家规模、国家规模与经济发展型式的相互关系也进行了开创性的研究。库兹涅茨、钱纳里、杨小凯等人的研究工作直接启示了我的选题和构思。1999年夏，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读者服务部首次看到钱德勒的《企业规模经济与范围经济》一书时，钱德勒的研究思路更坚实了我的想法。

到一定程度会引起质变。由于国家是社会经济活动和政府管理的最大的基本单位，人口、国土、收入等经济因素在国家范围内的聚集状态就呈现为国家的经济规模，简称为国家规模；而大、中、小等不同经济规模的国家可能演化出其企业、市场、生产、地区等各不相同的经济效应、经济结构、经济形式、经济制度和经济行为。

比较而言，根据人口、国土、收入等经济因素的规模或量的特征，进行经济的规模包括国家规模的比较和分类，进而从经济规模特别是国家经济规模的角度分析经济发展和政府管理，既是目前理论工作中相对薄弱的环节，又是具有相当意义的研究角度。实际上，人类进行经济活动和经济理论研究的一个基本约束条件就是资源规模的相对稀缺性。如果自然资源相当丰富多样，猿类也不会在这几百万年前走出森林，人类也不会开始胼手胝足的劳动谋生过程；进而，如果劳动能够轻而易举地创造出丰富多样的物品，人类也不会费心卖力地进行制度创新和技术发明，正如R·H·科斯所说的，交易无成本则产权不重要。然而，资源的稀缺性使得从个人和企业的微观经济活动，到国家和人类的宏观经济活动都缩手缩脚，必须每时每处地计算成本收益问题。为了更好地占有和使用资源，人类又创造出政府这个怪物。

中国是改革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更是一个地域、人口、资源、历史大国和潜在的经济大国。因此，从经济规模特别是从国家经济规模角度分析中国的经济发展和政府管理，将是本书的研究角度和对象。古今中外的经济发展和政府管理实践已经隐约地昭示了这么一种规则：国家规模不同，其经济发展方式和政府管理方式随之不同。《老子》对此就有天才的发现，“治大国若烹小

英国哲学家T·霍布斯在1615年写成的一部政治哲学著作就名为《利维坦》。利维坦(Leviathan)是《圣经》中记载的一种巨大的水生怪物，中文曾译为鳄鱼，霍布斯用它来比拟政府。见：

[英]T·霍布斯·利维坦·黎思复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

鲜”，治理大国要像煎小鱼那样，不要经常翻动它；而“小国寡民”可以限制分工和交换，“民至老死不相往来”。

相对而言，人们从其他角度对经济发展和政府管理方式已经进行了较多的研究工作，从大国角度分析经济发展和政府管理方式尚是目前理论工作中的薄弱环节。实际上，生产要素和经济活动的规模状况直接引致了规模经济、范围经济、外部经济、聚集经济等经济效应，进而制约着一国的分工、专业化、市场结构、资源配置、区域经济、经济开放等经济发展型式，并影响着一国的政府管理方式。作者拟从国家规模这一整体和综合的角度，展开对大国特别是中国的经济发展和政府管理的具体分析工作。

三

研究对象确定之后，研究方法对理论发展就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方法论的差别，使研究者在观察和分析的角度、广度和深度，思维的形式和过程，论述和表述的形式等方面各有不同。新方法的提出和运用，往往会促使理论获得重大进步，甚至产生革命性的结果，这种状况在经济学和其它学科的发展历史上屡见不鲜。亚当·斯密关于利己主义的经济人假设、关于三个阶级和三种收入、关于市场范围等方面的研究工作，实际上已经开创了微观分析与宏观分析并重的研究风格。不过，后来的经济学家偏重于了经济活动的简单孤立的微观分析，马克思关于社会再生产和

通行的《老子》（即《道德经》或称《德道经》）第61章、第80章等部分对此作了很有价值的论述。老子的辩证法思想对于政府提高管理水平具有许多借鉴意义《孙子兵法》、《韩非子》等中国原典也包了许多睿智的治国思想“大国”、“小国”，长沙马王堆汉墓帛书《老子》作“大邦”、“小邦” 不过，更早的竹简《老子》中没有“小国寡民”的思想。见：

侯才：老子及其学说的再发现，光明日报，1999-11-05

经济危机的理论、L·瓦尔拉的一般均衡理论虽然指出了综合的、整体的分析方向，但直到凯恩斯发表《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这种研究方法上的偏向才开始得到全面纠正。威廉·配第、F·魁奈、亚当·斯密、马克思、L·瓦尔拉、马歇尔、凯恩斯、K·阿罗、O·摩根斯坦等人在经济分析方法上作出了重大贡献。

方法论是一个内涵极其不稳定的概念。中国以往的文章在提及方法论时，往往习惯地以辩证唯物主义、科学抽象法等相标榜，而实际上许多文章或者不用这些方法论，或者滥用这些方法论。近来许多文章又喜欢把历史描述和逻辑抽象、证实和证伪、静态分析和动态分析、数理计量分析和统计分析等名词搬进来，而实际研究中既不正确区别也不具体运用，研究成果或是概念的罗列，或者是现象的描述，或者是政策的注释，理论研究、传播和评价的正常规范远未形成。在学术研究的各种方法中，数学格外受到推重，数学方法的运用甚至被看作一门学科真正成熟的标志。然而，数学作为人类思维最精致的花朵，在其诞生和发展过程中已经几次濒临萎败。非欧氏几何是对数学绝对真理观的第一次沉重打击，而更大的冲击来自1931年K·哥德尔的发现：不仅仅是数学的全部，甚至任何一个系统，都不可能用类似哥德尔使用的能算术化的数学和逻辑公理系统加以概括。由此，当前的数学有许多种而不是只有一种，而且每一种都无法使对立学派感到满意。数学家已经放弃了数学统一性、科学性的神话，经济学家更不能依靠数学工具建立统一科学的经济学体系。实际上，许多经济学原理只

数学发展史上已经发生了几次危机，M·克莱因对此做了生动的描述，而目前普遍使用的欧氏几何工具只是众多几何体系中的一种，它对人类现实的生存环境可以有一个较方便的描述，就如牛顿力学对日常生存环境的描述。见：
[美] T·s·库恩·必要的张力·科学的传统和变革论文选·纪树立等译·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1

[美] M·克莱因·数学：确定性的丧失·李宏魁译·长沙：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1997

是经济学假设罢了。

作者在确定研究方向时就已经发觉，国家规模以及它与经济发展和政府管理的相互关系这个选题，既要进行经济理论的分析，又要进行经济实践的比较，由此所采用的分析方法就略显驳杂了。大致来说，在分析论证中将主要运用的两种方法：一是理论的逻辑推演；二是实践的比较归纳。一方面，以经济学上及会计学上的生产成本和交易成本、信息、时间等为核心的经济概念，以经济人假设、成本—收益比较等为基本的分析原则，微观分析和宏观分析相结合而以宏观分析为重点的分析方法，对国家规模条件约束下的经济发展和政府管理方式进行了比较系统的分析。在分析过程中，尽可能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经济思想，同时吸收了西方经济学中旧新古典经济学、旧新制度经济学等学派的合理内容，以及政治学、历史学等学科的相关成果，也可以说，进行跨学科的交叉研究。另一方面，对国家规模条件约束下的国内国际的经济发展和政府管理实践进行了比较研究。在分析过程中注重分类和类比，既分析不同国家规模的经济发展和政府管理，又对不同经济发展阶段的经济发展和政府管理进行比较分析。最终，通过比较理论假设和经济实践的相符相异状况，给出大国特别是中国经济发展和政府管理的可能性结论，以提高理论的解释和预测能力。

贯穿整个研究过程的一个基本思想是：人类的一切活动始终取决于自己所处的物质生活条件；只有从物质生活条件，从经济活动的性质和方式去考察人及其活动，包括政府及其管理活动，才能描绘出人类活动的真实过程和发展趋势：这实际上就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发展观念。政府作为人类管理社会经济活动的工具，其性质和形式受到生产关系即产权制度和生产力即生产技术的制约，特别是生产力的发展水平从根本上决定着政府的性质和形式。由此，对政府管理的分析，就不能仅仅停留在产权制度决定的层面上，而应该进行更深层面的发掘和研究。经济规模是社会生产力的一个

重要表现形式，很有必要对经济发展和政府管理进行经济规模特别是国家的经济规模约束下的综合分析。而分析政府管理，又常常不能直接从经济规模的国家层面入手，因为经济规模影响经济发展，经济发展的不同水平和方式决定着政府管理的方式和政策内容，政府的管理活动是经济规模 and 经济发展状况的函数。因此，本书的叙述顺序首先是国家的经济规模即国家规模的分析，其次是国家规模约束下的经济发展分析，最后是政府管理的分析。

当然，国家规模与经济发展、政府管理之间存在着错综复杂的关系，决不是一种简单机械的规模或数量决定论能够解释清楚的。制度规则、分工和技术、生产与交易效率等因素在国家规模要素与经济发展、政府管理之间，往往起着中介和耦合作用，不同的制度规则和生产交易效率可能导致经济发展和政府管理的不同分叉和演进。正如在非平衡系统中，通过涨落可以达到有序。当代物理学中统称为混沌理论的一些分支，已经对可逆性和不可逆性、决定性和随机性、对称性和非对称性、简单性和复杂性、稳定和不稳定、进化和退化、有序和无序等一系列范畴进行了重新讨论，这种讨论结果也开始影响经济学的发展。 但不论如何，经

比利时物理学家I.普利高津创造性地发展了当时称为耗散结构理论的混沌理论，他本人于1974年获得了诺贝尔奖。国内最早系统介绍耗散结构理论的当首推湛垦华等人。1986年，三家出版社又推出了同一选题的读物：科学出版社的《非平衡系统的自组织》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的《从存在到演化》，四川教育出版社的《探索复杂性》。不过，国内经济学界一直只有极少数人注意到了混沌理论对经济学的冲击，沈华嵩曾经出版了《经济系统的自组织理论》，上海译文出版社1996年出版《混沌经济学》后，反响寥寥。1987年，笔者因为对耗散结构理论略有所知，打算以“经济危机的自组织理论解释”为毕业论文选题时，因无人指导而作罢。场小凯最近几年所作的研究工作，实际上把经济发展与制度、结构变迁很好地融合在了一起。见：

湛垦华等．普利高津与耗散结构理论．西安：陕西科学技术出版社，1982
[比]G．尼科里斯，I．普利高津．探索复杂性．罗久里等译．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1986

[美]R．H．戴等．混沌经济学．傅琳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6

济规模约束下的成本收益比较应该是决定经济发展和政府管理的一个基本因素。

在研究和写作过程中，作者常常面临着困惑或困难，诸如选题外延太大，涉及领域太多，相关问题接踵而来而目不暇给，贪多求全而浅尝辄止；统计资料或者数量太少，或者数据矛盾，或者口径不一，这种情况在中国国家统计局的《中国统计年鉴》、世界银行的《世界发展报告》等权威性的出版物中也经常出现；作者对国内外的经济理论动态把握不够，理论分析能力面对复杂多样的经济现实而相形见绌。

从更高的标准看，一种理论最好能够形成概念规范、命题严密、结构完整、内容自洽的逻辑体系，具有较高的解释能力和预测能力。经济学是一门精密和严密的经验科学，要对复杂多样的经济活动的内在联系和发展规律作出准确的解释和说明，仅有归纳和比较是不够的，还必须进行逻辑演绎和经验实证，进行必要的数量分析和理论形式化。不过，由于学识所限，本书离这种标准仍有较大的差距。可以说，本书只是对选题作了初步的分析和叙述工作，主要采取的是归纳分析和规范分析方法，某些分析方法和分析结论需要认真论证，某些内容甚至可能是错误和可笑的。在国家规模与经济发展、政府管理之间的关系上，肯定还存在着许多分析不完全甚至盲态的领域。因此，如果我的选题是一种有价值的研究方向，那么就诚恳希望有更多的同仁继续深化这方面的研究工作。

四

本书主要内容可以分为三部分：国家规模；国家规模与经济发展；国家规模与政府管理。

国家规模的回顾和分析主要集中在第一章。对国家规模的划

分和使用由来已久，但学术化、数量化的分析工作是近代社会的事情。本书首先回顾和分析了国际统计和比较、综合国力、国际竞争力等研究领域中的国家规模研究工作，提出了研究上的两种基本方法，即要素法和功能法。国家规模的核心内容是国家经济规模，在现代经济体系中，经济规模首先是指市场规模或市场范围。在此基础上，重新定义了构成国家规模的三项基本要素：人口、国土和收入；分析了影响三要素规模的制度性、组织性因素，如人口的素质、流动和组织性，国土的资源密度，收入的购买力平价等，以及这三项要素的权数值。这样，就可以建立衡量国家规模的模型，并利用统计资料计算主要国家的规模状况。

国家规模与经济关系的分析是第二章至第七章的主要内容，这一部分重点分析了国家规模与分工和专业化、国家规模与市场结构、国家规模与积累、国家规模与资源配置、国家规模与区域经济、国家规模与经济开放的相互关系。

由于分工和交易是现代经济活动的基本方式，分析分工和交易就可能解开经济活动中的许多奥秘。斯密曾经提出分工受市场范围的限制，这一经济思想虽被经济学家长期冷落，但成为分析国家规模与经济关系的始点。国家规模对分工的影响首先表现在分工产生的原因上：资源短缺是促使分工的压力因素，一定量的资源聚集是保障分工的支持因素。本书从供给和需求两方面分析了经济规模与分工的相互关系，这种经济机制进而可以解释规模经济、市场结构、区际贸易和国际贸易、资源配置等一系列经济现象。大国的经济规模特征使得区域内部分工和国家内部分工都相当发达。

规模经济是由于分工而产生的一个极其重要后果，尽管分工并不是形成规模经济的必要条件。国家规模与规模经济的相互关系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表现出来：一是国家的行业或产品种类；二是行业中的企业数；三是规模经济的要素特征。经济规模制约着